



岭/南/理/论/视/野/丛/书

产业集聚、扩散与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赵祥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岭/南/理/论/视/野/丛/书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产业集聚、扩散与 区域协调经济发展

赵祥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产业集聚、扩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赵祥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 7
(岭南理论视野丛书)
ISBN 978-7-218-08953-9

I. ①产… II. ①赵… III. ①产业经济—关系—区域
经济发展—协调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3292 号

Chanye Jiju Kuosan yu Quyu Jingji Xietiao Fazhan

产业集聚、扩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赵祥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责任编辑: 卢雪华 曾玉寒

装帧设计: 贾萌

责任技编: 周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东莞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18-08953-9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38.25 插页: 1 字数: 560 千

版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 001

第二章 文献评述 / 028

第一节 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 / 028

第二节 产业扩散的动因与路径 / 044

第三节 区域经济差距与区域协调 / 055

第四节 简要的评述 / 065

第三章 分析框架和理论假说 / 070

第一节 总体分析框架 / 070

第二节 市场选择与产业空间分布格局 / 082

第三节 政府行为与产业的空间分布格局 / 093

第四节 理论框架与理论假说 / 112

第四章 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成长的视角 / 118

第一节 产业集聚与商业信用 / 118

第二节 产业集群促进技术创新的机制分析 / 133

第三节 产业集群与企业成长 / 146

第四节 专业化、多元化与企业成长 / 168

第五章 我国产业集聚的规模分析 / 186

第一节 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差距 / 186

第二节 我国地方产业集聚的规模分析 / 198

第三节 我国代表性工业部门的集聚规模 / 234

第四节 影响我国产业集聚的制度障碍 / 246

第六章 我国工业空间格局的演变与区域协调发展 / 292

第一节 我国省区产业集聚的特征与形成机制 / 292

第二节 我国工业部门扩散的可行性分析 / 323

第三节 我国工业部门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变 / 339

第七章 产业扩散的部门特征 / 371

第一节 理论假说与实证方法 / 371

第二节 产业扩散的部门特征分析 / 380

第三节 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域重新布局 / 417

第八章 政府行为与产业的区位选择 / 428

第一节 地方政府竞争与产业区位选择：以 FDI 区位分布为例 / 428

第二节 产业扩散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447

第三节 产业扩散过程中地方政府合作行为的博弈分析 / 464

第九章 广东产业空间格局与区域经济差距的演变 / 491

第一节 广东省地区专业化的特征 / 491

第二节 广东省产业空间集聚水平的演变 / 496

第三节 广东省区域经济差距及其动态变化 / 505

第十章 广东省内区际产业扩散研究 / 511

第一节 广东省内区际产业扩散的现状与特征 / 511

第二节 市场力量、政府行为与广东省内产业扩散 / 539

第三节 广东省内产业扩散的问题与对策 / 564

参考文献 / 588

第一章

导 论

一、本研究的理论背景

自马歇尔（Marshall，1890）提出产业集聚的外部性理论以来，产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动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就引起了持续的理论关注。马歇尔把生产规模扩大所引致的规模经济效益分为两类：一类取决于产业的整体发展，另一类取决于单个企业的资源、规模及管理效率。前者称为外部规模经济，后者称为内部规模经济，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厂商追求分享外部规模经济的结果。所谓外部规模经济是指当众多厂商集中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时，整个产业的规模扩张可以导致厂商平均生产成本下降，单个厂商可以从整个产业的发展中得益。这种得益主要来自于产业集聚所产生的三种外部性，包括地方化的劳动力池效应，专业化中间投入品共享和技术外溢。这三种外部经济效应降低了产业集聚区内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并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到集聚区，从而实现集聚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扩展马歇尔外部经济内涵的基础上，区域经济研究文献进一步将产业空间集聚、报酬递增和区域增长及区域经济差距联系起来，并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条相互关联的研究路径。

（一）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路径

自20世纪90年代初克鲁格曼提出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模型（CP模型）以来，很多文献运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产业集聚的形成机理和经济后果进行了研究（Krugman，1991）。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假设不同，“中心—外围”模型假设存在两个规模报酬不同的部门：一个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完全竞争的农业部门；另一个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具有垄断竞争特征的制造业部门。制造业部门工资的名义值和实际值之间存在地区差异，工人可以根据实际工资的高低在地区之间自由流动。每个制造业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选择区位，同时制造业产品存在“冰山型”固定比率

的运输成本^①。在以上假设的基础上,该模型将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制造业份额与工人的流动份额内生化的,得出了产业集聚水平与运输成本的非线性关系。当运输成本很高时,较小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较低的制造业份额不利于产业的地理集聚,制造业部门选择靠近消费市场的区位进行生产,产业在两个区域均匀分布。当运输成本下降到中间水平时,由于存在较强的市场接近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一个地区的市场需求越大,该地区的制造业份额也越大,商品价格指数也就越低,工人的实际工资也越高,从而能够吸引更多工人流入本地区,这将促使该地区的市场容量进一步变大。由于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就会迁入该地区,制造业从两地区均匀分布演变成一种“中心—外围”的分布格局。中心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上升,成为制造业产品的净出口地,实际工资上升,经济增长加速;而外围地区缺乏制造业,主要从事农业等初级产品生产,实际工资较低,经济增长缓慢,从而导致中心与外围区域的发展差距扩大。当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时,外围地区的要素成本降低抵消了市场接近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的好处,产业就可能重新出现分散化的趋势。一部分产业从中心区向外围地区扩散,外围地区与中心区实现了新的产业分工,经济增长加速,与中心区的经济差距逐步缩小。在吸收克鲁格曼经典 CP 模型思想的基础上,新经济地理文献不断改进模型的假设,引入新的流动生产要素,运用主流经济学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演绎产业集聚的不同的形成机制和后果,以揭示地区增长的非连续性和非均衡性。在这一领域先后出现了自由资本(FC)模型(Martin & Rogers, 1995)、自由企业家(FE)模型(Ottaviano, 2001; Forslid, 1999; Ottaviano & Forslid, 2003)、资本创造(CC)模型(Baldwin, 1999)、本地溢出(LS)模型(Baldwin, Martin & Ottaviano, 2001)、全域溢出(GS)模型(Martin & Ottaviano, 1999)、垂直核心—边缘(CPVL)模型(Krugman & Venables, 1995; Venables, 1996; Fujita, Krugman & Venables, 1999)、自由企业家垂直联系(FEVL)模型、线性自由资本(LFC)模型(Ottaviano, 2001)以及线性自由企业家(LFE)模型(Ottaviano, Tabuchi & Thisse, 2002)等。随着建模技巧的不断改进,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伴生关系越来越成为一个普遍的理论共识。产业集聚所产生的外部效

^① “冰山型”运输成本是对运输成本形式的一种假设,即假设所运输的产品只有一部分到达目的地,其余的在途中“融化”了,这部分“融化”了的产品可以被看作运输成本。设产品到达目的地的比例是 g , 即 $1 - g$ 比例的产品在运输途中消耗掉了。如果产品在国内的价格是 p , 则把该产品运到国外的价格是 $P = p/g$, 那么单位产品的运输成本是 $(p/g) - p$ 。这种假设在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文献中经常被使用。

应有助于降低厂商的生产成本,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同时,由于贸易成本和递增收益的作用,工业部门会向拥有较大最终需求和创新更多的地区,因而也是增长更快的地区集中,产业集聚也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加强。这种集中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会引起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

新经济地理文献在运用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上的成功也激发了相应的实证研究,现有文献用劳动生产率、新企业诞生的数量、产值增长和工资增长等变量来衡量经济增长,认为产业集聚通过影响这些变量而间接地影响了一个地区的增长表现。虽然各个研究使用的数据样本和回归模型不同,在结论上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但大多数文献基本上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是导致区域不平衡增长的重要因素。例如,西考恩和豪(Ciccone & Hall, 1996)认为就业的空间密度是区域递增收益的来源,产业集聚通过运输成本、知识外溢和金钱外部性三个途径影响了美国各州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他们发现就业密度每增加一倍,平均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6%,全要素生产率提高4%左右,这种地方化的收益递增效应可以解释一半以上美国州际劳动生产率差异。其他文献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Baptista, 2001; Ciccone, 2002; Brulhart & Mathys, 2006; Ottaviano & Pinelli, 2006; Braunerhjelm & Borgman, 2006; 范剑勇, 2006, 2008; 世界银行, 2009等),即产业集聚通过提高厂商的生产效率而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因而产业集聚水平差异直接导致了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

(二) 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的路径

产业集群是产业集聚的结果和组织形态,自从波特(Porter, 1990)将产业集群与地区竞争力联系起来之后,产业集群便被一系列文献用来解释地区竞争优势的形成和地区竞争力的差异(Pyke, Becattini & Sengenberger, 1991; Coyle, 1997, 2001; Stoper, 1997; Scott, 1998, 2001; Schmitz, 1995, 1998; Schmitz & Navdi, 1999等)。波特(Poter, 1990)的“钻石模型(diamond model)”把产业集群^①纳入了竞争优势理论的分析框架,创立了基于产业集群的新竞争经济理

① 在波特看来,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集群包括一批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产业和其他实体。具体包括零部件、机器和服务等专业化投入的供应商和专业化基础设施的提供者;集群还经常向下延伸至销售渠道和客户,并从侧面扩展到辅助性产品的制造商,以及与技能技术或投入相关的产业公司;最后,许多集群还包括提供专业化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政府和其他机构——例如大学、产业标准的制定机构、智囊团、职业培训提供者和贸易联盟等。

论。他认为产业集群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影响竞争和区域经济增长表现：首先，产业集群提高了该地区企业的生产力；其次，产业集群有助于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为未来生产力的增长奠定基础；最后，产业集群还鼓励了新企业的形成，并进而扩大了整个产业集群的规模。现有文献基本上都沿着这三条逻辑线索来分析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与新经济地理文献明显不同的是，产业集群的理论研究通常以企业理论为基础，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在分析方法上更多地体现了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综合。同时，在实证分析方面，由于缺乏系统的数据，案例研究则成为集群文献主要的分析方法。

马歇尔（Mashall，1890）在关注大量专业化中小企业空间集聚现象的时候提出了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s）概念，产业区内的外部经济效应促进了企业或产业的成长。在“马歇尔”传统产业区概念的基础上，以意大利学者为代表的“新产业区”学派对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的非经济因素倾注了大量精力。新产业区的首要标志是紧密的本地化网络，即区内经济主体在长期交往中所形成的正式与非正式合作关系，这种本地化网络在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意大利学者巴格那斯科（Bagnasco，1977）最早提出了新产业区概念，他认为共同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和政治上的同质性能够促进产业区内合作环境的形成，而高效的合作是区域经济成功的关键。关于新产业区最完整的诠释来自于皮埃尔和萨伯（Piore & Sabel，1984），他们将新产业区的形成归结为“灵活性”与“专业化”的结合，即“柔性专业化”。伴随着新产业区的兴起，制造业进入了柔性专业化生产方式取代福特制生产方式的第二次产业转换时期。在这一时期，企业间的合作对形成竞争优势尤为重要，而构建能促进企业间合作的制度环境便成为制胜的关键，在“第三意大利”^①等小企业集群内部，社区共同体和共同的社区意识极大地促进了企业间的合作。此后，贝卡蒂尼（Becattini，1990）将“第三意大利”地区的经济成功归因于在本地劳动分工基础上实现的外部经济，以及在当地共同文化、制度背景下企业之间的高效合作。拉贝洛蒂（Robellotti，1995，1997）在描述意大利产业区的特征时，认为共同的

^① “第三意大利”的概念来自经济社会学家巴格那斯科（Arnaldo Bagnasco），是指意大利东北部以及中部一带的地区，有别于历史上经济发达但逐渐衰落的西北部（第一意大利）和经济落后的南方（第二意大利）。“第三意大利”具体包括翁布里亚、马尔凯、艾米利亚——罗马涅、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威尼托、特兰提诺——阿尔托、阿迪杰和托斯卡纳等几个大区。二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些地区的经济依托产业集群得到了长足发展。

文化和社会背景将新产业区内的经济机构联系起来，并创造出一般情况下通常为隐含的行为规则。此后的研究进一步讨论了“社会—文化”的同一性对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意义，密切的社区联系与文化、政治因素一起保持了当地的一致同意（local consensus）和共同的价值观，有利于社会妥协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产业区内的企业与其他行为主体如零部件供应商、客户企业、地方政府、中介组织和研究机构形成了紧密的分工合作网络，而本地共享的社会人文环境则保证了这个专业化分工体系的高效运行，有力地促进了企业发展和本地区经济增长（Gertler, 1997; Alberti, 2001; Albaladejo, 2001; Schwanitz, Müller & Will, 2002）。

“新产业区”学派对非经济因素的关注使得经济社会学中的社会关系网络（social networks）根植性（embeddedness）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等概念可以轻易地被应用于产业集群研究中。很多文献发现，在形成产业集群的小地理单元内，社会根植性和本地网络对企业的经营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当企业的外部活动增加，外部环境变化剧烈时，本地的社会根植性会有力地保证区内企业合作的稳定性。由于空间邻近而发生的互动经历促进了集群内部社会资本的形成，社会资本促进了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而高效的合作行动推动了产业集群的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Isaksen, 1998; Hansen, 1997; Staber & Morrison, 1999; Porta et al, 2003; Morosini, 2003; McDonald & Vertova, 2002 等）。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在全球的兴起，以技术外溢为特征的动态外部性成为产业集群研究的另一个焦点。很多文献将产业集群看成一种有效的创新环境或系统，分工、制度和空间邻近有利于集群内的知识传播和信息交流，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产业集群内的技术学习和创新活动，而高效的技术创新则是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欧洲创新研究小组（GREMI, 1985）通过对欧洲 15 个产业集群区域和美国的硅谷的调查研究，认为社会人文环境有利于区内企业合作、信息交流和技术创新，是大量企业在该地域集聚的重要原因。萨克森尼（Saxenian, 1994）的研究生动地揭示了产业集群内知识流动和技术创新的实现机制。她认为美国硅谷的成功是由于区内的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行业协会等形成了一个高效的区域创新网络，而区内密切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人际交流对该网络的高效运行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卡玛格尼（Camagni, 1991）指出创新是“企业—客户—供货商”之间的集体学习过程，产业集群中的集体学习主要通过企业间的联系和合作，以及本地劳动力市场上熟练劳动力的流动来完成。布瑞曼

提和瑞提 (Bramanti & Ratti, 1997) 则强调“企业—客户—供货商”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纯粹的市场联系,还涉及了其他非市场关系,这些关系包含了能提高区域技术能力的制度和机构 (Conti & Giaccaria, 2001)。伦德瓦尔 (Lundvall, 1988) 和弗里曼 (Freeman, 1996) 进一步认为在人员流动和知识溢出的过程中,人际关系中的信任与承诺对正式和非正式学习网络都很重要,这些网络中的社会因素补充了经济分析的不足,有助于人们对地区临近重要性的认识。托曼等 (Tallman et al, 1999) 将这些社会因素归结为集群内部共享的文化传统、规则和制度规范。此外,企业集群的本地根植性增加了各创新主体在知识基础、知识处理系统和知识商业目标等方面的相似性,提高了集群技术学习的效率,大大加快了集群技术创新的过程 (Lane & Lubatkin, 1998; Keeble & Wilkinson, 1999)。

由于产业集群通常存在于地域范围较小的城镇地区,缺乏可供系统分析的统计资料,因此,大多数文献通过案例研究方式来探究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之间的联系。在发达国家产业集群的案例研究中,以欧美,特别是“第三意大利”地区的产业集群案例研究最具有代表性。贝卡蒂尼 (Becattini, 1990)、布兰蒂 (Bellandi, 1989)、拉贝洛蒂 (Robellotti, 1995, 1997)、派克和森根博格 (Pyke & Sengenberger, 1990)、萨克森尼 (Saxenian, 1994) 等是主要的研究者。此外,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产业集群在发展中国家大量兴起,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导致对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案例的研究逐渐增多。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包括:范迪克 (Dijk, Van, 1997) 对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产业集群的研究,查理 (Chari, 2000) 和诺瑞格 (Knorrinda, 1996) 对印度产业集群的研究,巴泽和施密茨 (Bazan & Schmitz, 1997) 对巴西南部赛诺谷 (Sinos Valley) 鞋业集群的研究,纳德维 (Nadvi, 1997, 1999) 对巴基斯坦西尔廓特 (Silkot) 不锈钢手术器械业集群的研究,以及我国学者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集群的研究 (王缉慈, 2001; 朱康对, 2002; 朱华晟, 2003; 王珺, 2003, 2006, 2008; 刘世锦, 2008 等)。通过案例分析,产业集群生产网络的本地化、技术外溢和基于地区惯例的社会联系等被认为是解释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重要机制。

(三) 本研究的理论起点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关于产业空间分布与地区增长的两条研究路径高度相关,但两条研究路径还未能真正融合起来。新经济地理学文献主要关注产业层面的规模报酬递增,并通过报酬递增将产业集聚和地区增长联系起来。借助于垄断竞争条件下的一般均衡分析,新经济地理文献通过寻找企业基于利润最大

化和消费者基于效用最大化的区位决策的均衡条件,来说明产业集聚的形成机理和经济后果。同时,新经济地理学与内生增长理论的结合使得生产函数方法被广泛运用于有关实证研究中。为了对产业集聚的增长效应进行系统的估计,大多数新经济地理文献不得不将研究限定于较大地理单元、大类产业层面的数据上。大部分研究选择省或州一级地理单元,另一些研究则选择了城市、郡一级地理单元,少数研究选择了县和邮政编码一级的地理单元。研究所选择的产业单元也不一致,选择2位数分类产业^①的文献最多,其次为3位数分类产业,也有极少数研究选择了4位数分类产业。这样的实证研究实际上难以深入到产业集聚体(产业集群)的内部去考察各种外部性影响区域发展的机制。因为产业集群经常发生在城市一级以下地理单元内,每一个集群通常只包含一个或数个小类产业(大约相当于4位数分类的产业)。因此,就研究的准确性而言,数据的产业合并层次越低、空间合并层次越小,产业集聚的研究指向就越接近产业集群,本地化生产网络所具有的增长意义也就越清晰。而在产业集群的研究方面,绝大多数文献以企业理论为基础,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来阐述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及其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所使用的数据大都来自于实地调查,缺乏统计上的系统性和连续性,导致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不适用,这使得很多研究产业集群的文献难以将集群成长与区域经济发展真正联系起来。

同时,产业的集聚和扩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决定产业在空间上是处于集聚还是分散状态,要取决于促使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和导致产业分散的离心力的大小。促使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包括静态外部性,如中间投入品关联效应、市场规模效应、劳动力匹配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等,以及以技术外溢为核心的动态外部性。而导致经济活动分散化的离心力则包括要素的不可流动性、市场分割和拥挤成本(congestion cost)。产业集聚通常伴随着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增长,导致区域经济差距扩大;但另一方面产业集聚也存在着最优规模,当产业集聚规模扩张到临界点后,由于区域离心力的作用,产业可能要重新趋向分散化。这一分散化

① 国际产业标准分类(ISIC)采用4级结构:一级为17个类别(categories),以1位字母A-Q编码;二级为60个类别(divisions)以2位数字编码;三级为159个组(groups),以3位数字编码;四级为292个小类(classes),以4位数字编码。目前ISIC包括一项派生分类,即欧盟内部经济活动的一般产业分类(NACE);两项相关分类,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产业分类(ANZSIC)以及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AICS)。ISIC与联合国的产品总分类(CPC)、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商品统一分类及编码系统(HS)——相对应,国民核算体系(SNA)也采用ISIC来描述经济活动的分类。

过程将有助于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现有文献充分讨论了前一个过程,而对后一个过程关注得还不够。具体到我国来说,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在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产业集聚的拥挤成本日渐增大,非贸易品价格快速上涨,产业扩散的现象日渐增多。但是这种现象还没有得到理论研究的充分关注。

此外,虽然市场选择是决定产业集聚还是扩散,并进而决定区域经济差距是扩大还是缩小的基础性力量,但是政府干预在产业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和变动过程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特别是在我国政府力量较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首先,我国各地政府基本上是发展型政府,经济增长、就业扩大和财税增长仍是各地政府重要的施政目标。因此,在经济分权的条件下,各地政府的经济竞争在所难免,各地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和开发经济资源,努力扩大本地投资规模,引导产业的本地化集聚。其次,过度集中的增长和扩大的区域差距并不符合中央政府的目标,会带来社会冲突、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和环境问题,因此,将区域差距保持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之内通常是中央政府行为的目标之一。而推动产业的区际扩散是快速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一个重要途径,落后地区可以通过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促进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事实上,近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中央政府所提出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等区域发展战略,以及江苏的“产业南北转移”^①和广东的“双转移”^②等区域发展措施都想通过引导产业的区际扩散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但是,地方政府行为和上级政府的垂直协调究竟会对产业的空间分布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一问题还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在上述文献背景下,本课题提出了自己的研究任务,试图回答以下几方面问题:(1)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归结为产业集聚对区域内企业成

① 2004年3月2日,江苏省政府下发《关于促进苏北地区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确立了加快欠发达的苏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区域战略。此后,2005年,江苏又先后出台《关于加快苏北振兴的意见》、《关于加快南北产业转移的意见》以及《关于鼓励苏南产业向苏北转移奖励政策有关实施办法》等政策文献,力图通过推动苏南产业向苏北扩散来缩小两地之间的经济差距。

② 自2005年起,为了促进落后的山区、东西两翼地区(又称广东省的东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广东省引导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市与欠发达地市对口合作,在欠发达地区建设产业转移园,鼓励产业从珠三角地区向园区转移。2008年,广东省又提出推进珠三角产业向本省欠发达地区转移和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双转移”战略,把推进产业区际转移作为缩小省内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

长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对产业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进行分析,以揭示产业集聚或集群网络是如何通过影响企业成长过程来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2)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差距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随着产业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区域经济差距会经历怎样的变化?(3)对我国产业地方化集聚的最优规模进行实证分析,利用我国经济发展数据分析我国产业空间分布格局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即从产业空间分布的动态趋势来看,目前我国制造业是继续处于集聚的过程中,还是已经进入了产业扩散阶段?(4)在当前经济转轨时期,推动我国产业空间分布格局发生演变的力量与机制是什么?市场和政府各自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产业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轨迹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研究的主要贡献。此外,本研究将尝试在更小的地理单元和产业层次上,尽可能将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的研究融合起来,以更清楚地揭示产业集聚和地方化生产网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二、本研究的实践背景

(一) 产业集聚与我国区域经济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也在不断拉大。根据附表1的数据,我们可以按照2000年和2009年人均GDP的算术平均值大小将我国各省区划分为四个梯次:第一梯次地区的指标值在30000元以上,包括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第二梯次地区的指标值在20000-30000元之间,包括内蒙古、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七省区;第三梯地区的指标值在10000-20000元之间,包括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陕西、青海、宁夏和新疆十七省区;第四梯次地区的指标值在10000以下,包括贵州、云南、西藏和甘肃四省区。可见,从人均指标来看,除内蒙古以外,经济发达的第一、二梯次的地区均为东部沿海省区;而除了河北省以外,经济欠发达的第三、四梯次的地区均为中西部省区。

此外,根据各地区2000年和2009年GDP总量的算术均值的大小,我们同样可以将全国分为四个梯次地区:第一梯次地区的指标值在10000亿元以上,包括河北、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和广东六省区;第二梯次地区的指标值在5000-10000亿元之间,包括北京、内蒙古、辽宁、黑龙江、上海、安徽、福建、湖北、湖南和四川十省区;第三梯次地区的指标值在3000-5000亿元之间,包括

天津、山西、吉林、江西、广西、重庆、云南和陕西八省区；第四梯次地区的指标值在 3000 亿元以下，包括海南、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七省区。可见，从 GDP 总量来看，除了河南省以外，GDP 超万亿元的地区均为东部沿海省区；而除了天津和海南以外，GDP 在 5000 亿元以下的均为中西部省区。

把上述两个指标值组合起来，我们可以发现人均 GDP 大于 20000 元，且经济总量超过 10000 亿元的地区有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个东部沿海省区；而人均 GDP 小于 10000 元，且经济总量在 3000 亿元以下的地区有贵州、西藏和甘肃三个西部省区。粗略地说，这两组地区分别代表了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和最不发达的地区。^① 显然，从指标的绝对值来看，二者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那么，造成这种区域发展差距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

现实中有许多因素会影响到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表现，并导致区域经济差距的产生，如区位、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条件、市场开放水平和制度环境等，但这些因素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是间接的，它们要通过影响产业的空间分布来发挥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贸易成本的降低并没有削弱地理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一国内部距离大型市场较近的地区经济活动的空间密度较高，经济增长速度也较快。2005 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主要包括渤海湾、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生产总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而其地理面积却不到全国的 1/5。巴西中南部的米纳斯吉拉斯、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三州区的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超过了 52%，而其土地面积不足全国土地面积的 15%。而在埃及大开罗区的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达 50%，但其土地面积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0.5%（世界银行，2009）^②。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势必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个普遍事实是，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平衡分布往往伴随着显著的区域经济差距。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GDP 可以分解为三次产业增加值之和，因此，通过产业分解，我们可以弄清楚地区经济差距主要是由哪些产业发展的差异引起的。崔（Tsui，1996）、林毅夫等（1998）、魏后凯（1997）以及范剑勇和朱国林

① 不少研究我国区域差距的文献认为，我国区域发展差距主要体现为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的差距，而各区域内部省区之间的差距较小（Chen & Ravallion，1996；林毅夫等，1998；Jian, Schs & Warner，1996；陈秀山等，2004；许召元、李善同，2006）。

② 资料来源于：世界银行 2009 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 页。

(2002)都对我国地区经济差距进行了产业分解,得到了基本接近的结论,即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地区经济差距扩大主要是由工业的空间不均衡发展引起的,工业部门向东部沿海地区聚集导致沿海省份与广大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扩大。图1-1显示了我国工业增加值和GDP在省区间分布的空间基尼系数,从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二者具有相同的变动趋势,相关性很强,简单的统计分析表明,两者的相关系数达0.98。此外,根据《中国产业集群发展报告(2007—2008)》的统计,我国产业集群^①中的绝大部分也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省区。我国目前共有各类产业集群4605个,其中,东部地区分布3630个产业集群,占总数的78.8%,江苏、山东、广东与浙江四省现有产业集群数量分别为678个、661个、608个和561个,占总数的比重分别为14.7%、14.4%、13.2%和12.2%,四省份合计所占比重为54.5%。中部地区有557个产业集群,占总数的12.1%,河南、湖南和湖北产业集群数量分别为177个、105个和98个,占总数的比重分别为3.8%、2.3%和2.1%。西部地区有418个产业集群,占全国产业集群总数的比重仅为9.1%,四川有112个,占2.4%,广西有60个,占1.3%。^②显然,我国产业集群的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是较为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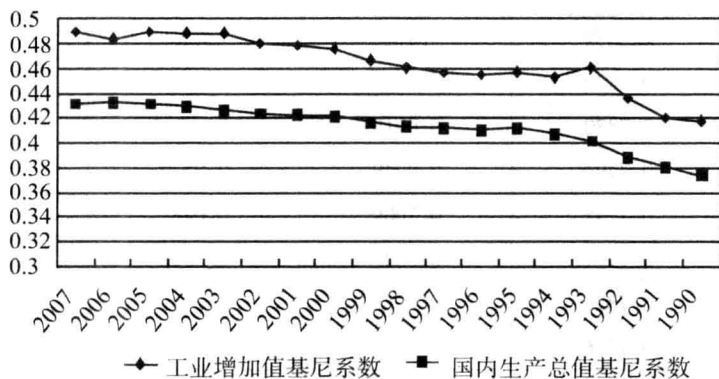


图1-1 工业增加值和GDP的空间基尼系数

从省区内部区域经济的发展来看,我国省级地理单元通常幅员辽阔,内部各地区资源、要素条件也有很大差异,经济发展也很不平衡。根据我们的调查,在

① 该报告将以县级行政区为单位的行业产值占全国行业总产出的比重前十位的地区视为产业集群区。

② 资料来源于:刘世锦:《中国产业集群发展报告(2007—2008)》,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版。

内部经济差距较大的省区往往可以观察到明显的产业空间集聚现象,产业集聚在推动本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产业空间集聚和镇区专业化现象十分普遍。目前,在被调查的1117个镇(街道办)中,专业化产业产值超过1亿元的有326个,共有特色产业524个;专业化产业产值超过10亿元的有95个,共有特色产业128个;有集群经济发展潜力的镇(街道办)236个,特色产业350个。这些产业集群中的绝大部分位于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①,它们在促进本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拉大了珠三角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差距。表1-1总结了广东省四大区域的产业平均集中率,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2001年间珠三角的产业平均集中率最高,达为78.7%,2009年最低为74.22%,2000—2009年间平均为77.13%。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广东省33个SIC-2分类的工业部门近80%的产出集中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而2000—2009年间东西两翼和山区三个区域的产业平均集中率合计仅为22.87%。可见,广东省产业在空间分布上是很不均衡的,由此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省内各区域之间出现较大的发展差距。

表1-1 广东省内各区域的产业平均集中率

年度	珠三角	山区	东翼	西翼
2000	0.7830	0.0991	0.0471	0.0709
2001	0.7870	0.0919	0.0450	0.0761
2002	0.7794	0.0949	0.0470	0.0786
2003	0.7735	0.1009	0.0481	0.0775
2004	0.7791	0.0945	0.0516	0.0748
2005	0.7826	0.0986	0.0485	0.0702
2006	0.7726	0.1095	0.0463	0.0716
2007	0.7647	0.1180	0.0481	0.0692

^① 广东的理论界和决策当局将全省划分为四个经济区域,包括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以及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山区和东西两翼地区(亦称广东的“东西北地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中山、东莞和惠州市的惠城区、惠阳、惠东、博罗,肇庆市的端州区、鼎湖区、高要、四会;山区经济区包括河源、清远、梅州、韶关、云浮、惠州和肇庆七市;东西两翼经济区则分别包括东翼的汕头、潮州、揭阳、汕尾四市和西翼的湛江、茂名、阳江三市。本研究以下部分均遵循这一区域划分定义。